

毛泽东与康有为社会理想观之比较^①

夏婷婷,杜菊辉

(湖南工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部,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毛泽东与康有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下,怀着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在中西文化、新旧思想之间比较、取舍,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观。从思想来源看,毛泽东社会理想观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有某些相似性,如均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均受西方思想冲击等。当然,毛泽东社会理想观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主要的思想来源不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不同,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不同等。

关键词:毛泽东;康有为;社会理想观
中图分类号:A84;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6-0078-04

A Comparison of Social Idealities of Mao Ze - dong and Kang You - wei

XIA Tingting, DU Juhui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Mao Ze - dong and Kang You - wei, as passing on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ambitious ideals, shaped their own social idealities by comparing and selec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new and old ideologies. From the source of thought, Mao Ze - dong's social ideality are similar to Kang You - wei's, as both we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mpacted by Western thought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he main source of thought,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problems and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Mao Ze - dong; Kang You - wei; social ideality

泱泱中华大地,悠悠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人追求理想家园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大同理想作为世人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代表,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毛泽东社会理想观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大同思想的启蒙中略见雏形。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拟对毛泽东和康有为社会理想的思想来源作一番探究,以图能够更完整地理解毛泽东的社会理想观,进而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

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把今文经

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杂糅在一起,给世人描绘出一个“大同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先进思想曾经引起正在寻求救国之道的青年毛泽东的强烈思想共鸣,毛泽东在构建自己社会理想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受到了大同理想的影响。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社会理想观与康有为大同思想在来源上有着一些相同之处。

(一)均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儒学的熏陶中学以致用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熟稔经、史、子、集,儒家经文和传统文化观念扎根于思想深处。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他“成童

^① 收稿日期: 2010-07-06
作者简介: 夏婷婷(1987-),女,山西临汾人,湖南工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研究;杜菊辉(1963-),女,湖南湘阴人,硕士,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1]当然,康有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经师,他孜孜以求的不是章句训诂、典章名物,而是借儒家经学之精华,并注入许多经过自己改造了的西学和佛学的内容,去建构独具特色的大同理想社会。康有为说过自己的大同思想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积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而成。^[2]¹³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其灿烂辉煌的古老文明雄踞于世界的东方,长期受到儒学熏陶的中国士大夫,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一直是被中国作为中心的天下观所支配。在康氏的《大同书》中,不难发现它的字里行间依然渗透着一种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唯我独尊的世界观。康有为正是在这种中华思想的基础上,忽视了文化上的民族差异和时代差异,以儒家的“仁”来阐释西方文化中的平等博爱思想,提出“博爱之谓仁”,将西方人道主义中国化,并主张“厚薄远近之序,要立差等而行之。”^[3]梁启超在为康有为著的传记里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之中学也。先生之伦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仪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4]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对资本主义的弊病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使他对西方的学习热情大大减弱,则片面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儒教是中国热油的国教,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5]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对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是不容忽视的。

毛泽东的社会理想观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它的基本思想仍可看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影子;其“中国化”的特点,就在于它批判地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其中包括传统大同思想和受古代大同思想颇深的康有为的影响。在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君子已有高尚之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但“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因此,“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城。”“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有慈悲之心救小人也。”^[6]⁸⁵这种“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思想,就是以儒家“仁”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古代“大

同”理想的核心为“公有”,《礼记·礼运》篇把孔子大同理想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毛泽东早期社会理想中的“新村”计划显然就是以“公有”为核心,也是对古代大同理想的具体运用。康氏向往“太平大同”的美好理想,主张通过改造哲学来改变现实世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受其影响,毛泽东社会理想才得以实现从“天下为公”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转变。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深知儒家思想之内涵的。

(二)均受西方思想冲击,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学以实用

康有为年轻时在儒学、佛学及道学熏陶下,就阅读过“西书”,如《西国近世汇编》、《环球地球新录》等。直至访香港,证实了书中所读,则开始大量研读西方书籍。从惊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就,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保留,康有为漫步于中西思想之间。在撰写《实理公法》时,他已表现出致力于西化的观点。“实理”就是“公理”,“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这部著作所体现的思想是符合大同社会基本原则的,从而为大同理想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形态。康有为还扬弃了基本传统社会与政治价值,接受西方伦理和政治思想,如博爱、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其社会理想的素材,并确信自己找到了解决中学危机的途径,那就是“向西方学习”,^[7]“取彼长技而用之。”^[8]他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既不把传统知识一概抛却,也不对西学全盘吸收,而是结合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找出对策,并试图超越中西学的文化价值偏见,融贯中西,创造新文化,从而掀起了维新变革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早期社会理想观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大约从东山学堂读书开始,这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1971年毛泽东自己对当年思想历程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9]显然,这里说的读孔夫子的书,是学习和接受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读资本主义的书,主要是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然后才是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同周世钊的谈话中讲到读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

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毛泽东开始用学到的西方哲学思想批判分析中国传统哲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当时所接触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些是从西方哲学家原著中学习的,但更多的是从经过中国人选择、综合过的东西中了解的。这些东西糅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容,也加上了一些个人的理解,更好地体现了毛泽东“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的思想。毛泽东在其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为了寻找改造中国、救亡图强的道路,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社会理想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二

毛泽东与康有为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时代背景及生活阅历不同,也就注定了两人的思想存在很多差异。毛泽东的社会理想观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除了以上主要的相同点之外,亦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一)主要的思想来源不同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实行贵族世袭制的君主专制社会,其政治伦理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说”基础上,后注入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其趋向就是“禁欲”和对人性的漠视。康有为的社会理想观就是西方天赋人权思想与中国古代自然人性论融会贯通的结果。《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年的著作,它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天赋与人的社会公法而予以遵循。《大同书》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家庭,没有任何天然或人为束缚,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权;儿童老人皆教养于公产,实行‘公养’、‘公教’、‘公恤’。”在康有为看来,君主专制是“乱世”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是小康社会的政治制度,而民主制是“太平世”的政治制度。康有为试图借助中国古代的思想权威和西方天赋人权学说,穿上“时装”为现实理论理想服务。

毛泽东社会理想观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虽然在文化特性上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土壤中,但是在理论形态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列主义观察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

思主义开始大放异彩。严酷的现实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和认真思索、总结,促使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0]。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长期参加、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观。

(二)认识问题的方法不同

康有为早年阅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和《万国公报》,而这些译著和报刊则不少涉及到了进化论思想。如早在1859年经李善兰译出的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侯失勒的《谈天》,就有关于天体演化的知识。至19世纪80年代,赖尔的自然进化思想,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或多或少地被介绍过来。康有为深受西方自然科学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并从这些思想中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2]241}得出社会进化的结论。古代文化中的“变易”观念如《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不息”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康有为接纳进化论思想。康有为历史进化论思想既是其要求变革、创新的理论基石,也是其发展大同理想的方法论。

进化论的引入,虽然是近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革命,并且为后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唯物史观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但对当时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来讲,依赖“进化”走向革新仍是一种空想。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取代了进化论的地位。毛泽东在社会实践和思想转变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最初读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时,印象最深的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6]22}毛泽东不仅把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他“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而且运用这种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社会。

(三)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不同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大力宣传学习西方,主张中西文化兼收并蓄,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去发扬和创造,但总的倾向是让西学融合、依归于中学。他甚至说:“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吾中国法古经之治足矣。”^[11]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合乎国情,宜乎民俗”,西方无甚可学了。甚至说学西方乃“颠倒愚妄”,^{[12]706}“吾国数千年之政治、教化、风

俗之美”,“皆弃之”,“乃发狂行”,^{[12]890}“质而言之,多行欧美一新法,则增中国一大害。”由此看出,是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限制了他:限制了他追求理想时的反思,限制了他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限制了他的维新和改造,限制了他革除传统、抛弃帝王。正是因为康有为在中西文化面前,始终无法摆脱传统加之于他的烙印,也就注定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无法用正确的意识作用于实践,结果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最终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具有独立思考、不苟同于习俗的性格特点,这使他能冷静地对待中西文化。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他能够树立正确社会理想观的前提保证。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能够审时度势,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肯定其先进性,但又不满足于西方文化,他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而已是,是人生太无价值。”^{[6]638}他在研究西学的过程中不仅常常以传统思想与西学思想相互对照和印证,而且也常常以他对于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认识和了解,作为研究和评判西学的基础。因此,他对待西学的态度尤为谨慎,通过比较研究,有选择地吸收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他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6]498}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毛泽东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要以人民群众为文化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系统结构,以民族、科学、大众为评判中西文化的基本标准,批判地吸收中外古今文化的精华,创造性地建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为其社会理想观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理论条件。

历史的发展总是连续的,人们创造历史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的,思想的发展亦是如此。任何新思想和新文化都是在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

积累的基础上,在取精华弃糟粕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传统”二字,一切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康有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下,怀着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在中西文化、新旧思想之间比较、取舍,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观。毛泽东在前人的思想道路上,更是形成了“挈其瑰宝,绝其溜磷”的思想原则。在二者思想渊源的比较研究中,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旧世界的挑战者和新世界的构想者的社会理想是以怎样的基础得以发展的。尽管当中不乏空想和缺乏理性,但毕竟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 [1]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四)[M].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3.
- [2] 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3] 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 卷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4] 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71.
- [5] 列文森. 儒教: 中国的现代命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63.
- [6] 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0.
- [7] 马洪林. 戊戌后康有为对西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4(1).
- [8] 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一)[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2: 1038.
- [9] 范富仁.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转变过程探析[J]. 南京: 唯实, 2002(2).
- [10]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M]. 董乐山,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131.
- [11] 康有为. 日本书目志自序[M]. 上海: 上海大同译书局, 1897.
- [12]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责任编辑: 骆晓会